

为村人存史，也为社会留痕

——《许家村志》映照的历史变迁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作为地方志的一种，村志可谓“一村之全史”。相比省志、县志、乡镇志，村志包含大量历史细节，生动真实地映照出时代变迁，具有特殊价值。

地处青岛市辖区西南边缘的海青镇许家村，在当地有些年代的地图上甚至难寻其名，但其发展变迁与国运大势同频共振。刚刚出版的《许家村志》，广泛收集，博采众议，审慎择选，明示变化，被内行赞誉“为‘非历史专业学者所做史书里态度最严谨的著作’”。村史的启示，与宏大叙事是一体两面的共同体：这本厚实的村志，为村人存史，可寻根脉；也为社会留下细到丝缕的痕迹，对考察研究山东乃至中国的历史脉动，不啻为珍贵的基层史料。

以人中心写好村庄故事，书写重点在村民

有专家认为，《许家村志》既是一部村史，也是一部社会学著作。谈起谋篇思路，《许家村志》主编许衍刚说：“村庄是乡村的基本单元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村民是活动主体，村志的书写重点在农户、村民。”这本80万字的志书以人为本，全面记述了社会变革大背景下，一村人口的繁衍迁徙和生产生活变迁。

《许家村志》的人口篇，不仅详细记述人口繁衍、迁徙、寿命等统计数据，反映农村生育、婚姻、家庭等观念变化，还对“闯关东”人口、进城人口、出嫁人口、死亡人口分别统计，并对家庭规模变化、老龄化、人口外流等定量分析。一个普通村庄的人口变化，映照出一幅跌宕起伏的社会进程曲线图。

自新中国成立，许家村人口经历了“增加—减少—再增加—持续减少”的过程：1949年全村约500人，此后10年增加到680人左右，增长约36%；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生灾荒，“闯关东”人口增多，全村人口减少到560多人；1964年后经济好转，人口再度增加，至1978年户籍人口数量达到高峰，共704人；改革开放后，村内相继出现遣返人员回城、单职工家属进城、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增多、进城务工创业、老年人随子女进城居住等多种迁出事项，村内人口持续减少，2016年与1982年相比减少198人，减幅为29.9%。

人们常说农村老龄化严重，《许家村志》定量分析显示：2020年全村常住人口273人，年龄结构为：0—15岁人口15人，16—59岁人口126人，60—79岁人口108人，80岁及以上人口24人。60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48%。这笔账把农村老龄化状况清楚地呈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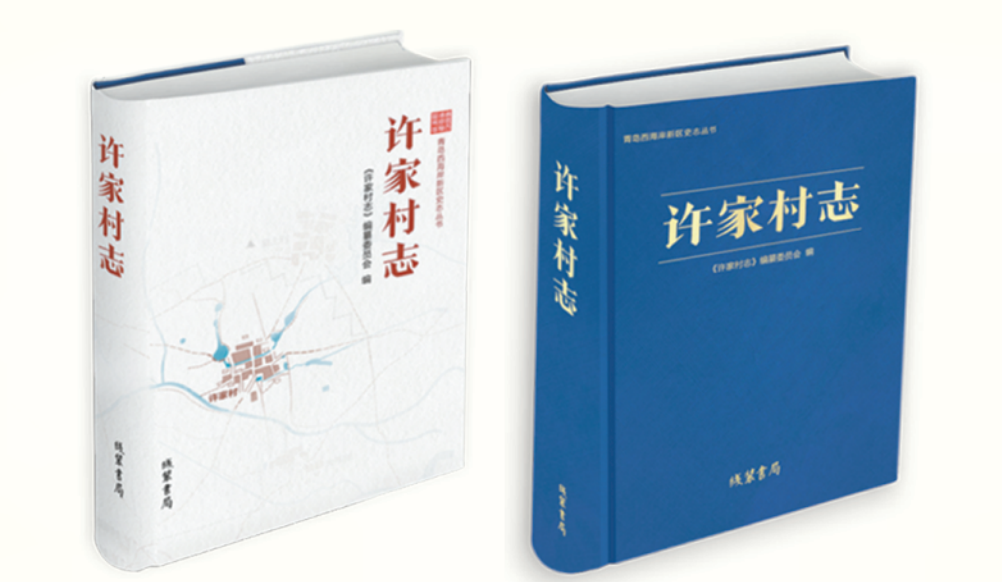
《许家村志》还算出另一笔账：1983—1992年全村户籍人口亡故52人，平均寿命64.71岁；1993—2002年亡故54人，平均寿命70岁；2003—2012年亡故42人，平均寿命75.43岁；2013—2016年亡故20人，平均寿命80.7岁。30余年间亡故人口平均寿命延长15.99岁。这说明老龄人口增加，与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条件改善也有很大关系。

与农村老龄化息息相关的是村庄人口的大量迁出。《许家村志》对此有详细统计，1985年—2003年，几乎每年迁出人口都是两位数，其中1985年最多，迁出32人。到2004年，迁出减至8人。2013年—2016年每年迁出1人。从在户籍看，迁出人口数量减少，而实际情况是村民离村进城脚步并未停止，“远走高飞”仍是年轻人的梦想追求，但他们都选择保留户籍户口。因为，国家政策已调整，农村有房屋、有承包土地，农村户口“吃香”了。

农民进城、城乡互动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壮丽景观，落到许家村则更具体生动。2016年底统计，许家村常住户有114户370人。基本不在村里居住或当年累计住村不足3个月的有48户94人，分别约占总户数的29.6%、总户籍人口的20.3%。他们有的在城区务工经商、买房定居，有的被子女接到城里养老，有的农闲在城里带孙、农忙回村收种，往来于城乡之间，过起候鸟式生活。

宏大处着眼，细微处用功

大政行天下，实效看基层。村志作为一村



的百科全书，不能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等重大事项，因为每一次变革都与村民的命运、利益息息相关。《许家村志》记载了土地改革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事件在村里的实施过程和落地效果，留存了大量历史细节。

1982年1月1日，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批转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。同年11月，胶南县委部署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改革春雷回荡在天地间，“大包干”在许家村落地。近40年过去了，当时生产队的集体财产是怎样处置的？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。编纂人员找出1983年许家村各生产队的“往来账”——这也是生产队最后的账本，查到集体财产处置的详细记录，摘录二队两户社员分拆款情况入志：

许衍柏，分牲口摊款每人13.89元，共55.56元；分农具摊款每人1.39元，共5.56元；分大缸1个2元，木头、折子0.1元，共2.1元。合计63.22元。

许家苍，分牲口摊款每人13.37元，共53.48元；分农具摊款每人1.34元，共5.35元；分粪粉器1个、氨水桶1个2元，折子0.1元，共2.1元；冲4月26号、27号单据分牛补款5.35元；余款55.58元。

对账上记载的“分牛补款”，编者不解，请教当时的小队会计，并在村志中加上说明：各生产队饲养的牲口只有十几头，采取几户社员分得1头的办法，因为每头牲口折款数额不同，“分牛补款”是对分得低价牲口各户的补偿。

许衍刚认为，村志编纂宜细不宜粗，应从宏大处着眼，细微处用功。不同时期乡村的许多细节，不仅承载着乡愁记忆，也是历史印迹，是社会发展各阶段的佐证。这部村志的编者在遵循地方志编纂规范的同时，调动各方面的知识积累，运用多种方法挖掘、记载村庄细节，形成鲜明特色。

以图证史。古志中的图经、图志、图记，以图为主，也是地图与说明文字的合称。图文互补是志书编纂的常用方法。《许家村志》共有图片526幅，除了场景、实物、人物照片，也有不少示意图、写实图，图文并重。主编介绍，讲求视觉艺术效果，是《许家村志》的编排要点之一。但大量图片穿插于志书，不能只为美化，更要起到证史作用。这部村志的各种示意图都是用心设计、反复修改的，精益求精，力求达到“一图胜千言”的效果。《许家村人在东北居住地示意图》，直观反映出许家村“闯关东”人数众多、居住面广的特点，也把在东北的许家村后人与祖籍联系起来。不同时期的村民住房平面图、效果图，则把农村居住条件的变化形象地展示出来。书中各种场景、实物照片不是随意堆积罗列，而是精心挑选编排，每幅图片必须具有史料价值。如不同年代的结婚证，生活困难时期的草鞋，1968年的山东省布票，1984年的土地承包管理使用证，2016年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，2017年贴在新式锅台后墙瓷砖上的灶王爷画像……都无声地见证着历史。

以表辅文。《许家村志》随文插入大量统计表，多数表格专为对比而设计，有的列数据，有的摆事物，编者想要传递的信息一目了然。

1966年与2016年“许家村家庭规模分类对比表”显示，时隔50年，村里1口之家由10户增至23户，2口之家由7户增至50户，3口之家由16户增至38户，4口之家由16户增至33户，5口之家由22户减为15户，6口之家由26户减为2户，7口之家由18户减为0户，反映出农村家庭规模变小的过程。“停止或减少种植的作物统计表”显示，从前许家村曾经种植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20余种，1965年后从广种薄收到以粮为纲，再到集约种植，目前集中种植小麦、玉米、花生三大作物，其他作物多数停止种植，有的零星种植。其他诸如“生产工具使用年代统计表”、不同年份“主要作物种植收入支出约计表”“办饭器具用品使用年代统计表”“建房用材更新年代统计表”“村民服饰变化年代统计表”等，更是将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列举出来，在对比中增加了说服力，为研究农村农业留下更多历史细节。

以“附记”扩展背景。有些很有价值的事项，村志正篇不能展开叙述，《许家村志》专设“附记”，予以详述，扩充了信息量。如《地瓜当主粮的年代》，记述自清乾隆年间到20世纪70年代地瓜引种栽培的历史，切晒地瓜干等劳作过程，以及地瓜不再当主粮的原因；《当年大队氨水池》，记述农业技术进步中“捏鼻子施肥”的特殊阶段；《割麦打场脱层皮》，记述生产队时期小麦收割、脱粒的艰辛；《推磨碾磨办饭忙》，记述从前农村粮食加工方法和妇女家务劳动的繁重；《曾经人人披蓑衣》，记述村里已经失传的蓑衣编织方法。《许家村志》共有附记21篇，留存了许多乡土记忆，也增强了可读性。

村庄的开枝散叶：村人“闯外”主要两条路

无论村庄规模，历史渊源还是当代业绩，许家村都无显赫之处。许家村与成千上万齐鲁村落一样，一方土地，一片农房，养育十几代人生生不息。凡俗世象背后是辈辈继承的精神血脉，激励村人为实现梦想百折不挠、奋斗不息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，许家村人口不断繁衍，但常住户数变化不大，多数年份都在150户左右，原因是“闯外”迁出人口多。梳理《许家村志》的浩繁记载，许家村人“闯外”主要有两条路。

一条路是“闯关东”。起因是人口增加，生产条件落后，有限的土地不能解决饱暖，穷则思变。每逢严重灾荒或社会动荡，更会有大量村民“闯关东”。清末民初“闯关东”的许家村人都是男劳力，他们徒步2000公里迁往吉林省延边，开荒种地。劳作几年，省吃俭用积攒一些钱财，回归故里盖屋娶妻，改变家境。路途遥远往返不易，在东北定居的许家村人逐渐增加，到1937年前后，全村累计“闯关东”的男性达215人之多，几乎家家都有“关东客”。吉林延边早有延吉岗地人，聚居那里的许家村人多了，被称为许家岗。后来黑龙江省鸡西市也有了许家大院。这些许家村人开枝散叶，逐步扩散到延吉、鸡西等地的更多村庄。

旧社会许家村人“闯关东”的历史，是寻求

摆脱贫困之路的迁徙史，也是艰难生存的血汗史，“死逼梁山下关东”的俗语至今挂在村民嘴边。村志记载，民国时期许立世从延吉回老家接家眷，用木制独轮车推着怀孕的妻子走了3个月。途中妻子临产，住进一家叫作“兴隆店”的旅棧生下一子，遂给孩子起小名为“兴隆”。许秉西、许秉业、许秉海、许秉竹兄弟4人，四弟留守许家村娶妻生子，3个哥哥“闯关东”，都是终生打光棍。老大、老二卒于延吉，老三带着二哥遗骨和兄弟们积攒的微薄财富返回家乡，与四弟一起置地持家，才算过上安稳日子。1932年版《海曲许氏谱系》记载的许家村男性，名下加注“游外”“无考”者多达141位，多半是“闯关东”失联。

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70年代，从许家村迁往东北地区的人口累计900人以上。估算他们在东北繁衍人口数量，早已超过许家村村内繁衍人数。一个平常小村的繁衍迁徙现象，反映出民族的韧性，以及人口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相互关系，丰富、深化着人们对区域生命历程的认识。

另一条路是求学外出。《许家村志》单列办学育人篇，以较多笔墨记述本村办学历程及求学外出村人足迹。许家村人虽身居僻壤但矢志向学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创办明开小学，1931年开办新式小学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省内诸城、青州、泰安、济南，省外北京、保定、奉天、万州等地，都曾留下许家村人的求学足迹。1949年办完全高级小学，1967年办联中，1975年办高中，许家村都是争先恐后，要人有人，要地出地，不打折扣。慷慨办学，代代接力，使许家村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文化庄子”。早在清代，许家村就出过7位大学生、监生，1位奖励举人。民国时期又有6人毕业于北平、济南的高等院校，其中4人就读于中国大学。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，全公社73个自然村共考出大学生20多名，许家村占8名。2016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：城乡人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，全国为68.68%，山东省为68.98%，而许家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75%。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18年，全村累计198人考入大学或中专学校，毕业后分别在20多个城市就业。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驻地的许家村人就繁衍到103户295人，分别相当于村内户数、村籍人口的63%。

这一系列数据背后，是一个个家庭为改变子孙后代的命运奋斗不止的故事。受崇德尚文、耕读传家村风影响，富裕人家最看重的不是扩建宅院，而是送子弟进城读书，不富裕的家庭也信奉“地瘦栽松柏，家贫子读书”的古训，千方百计保孩子上学。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，女生许传清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，家里却揭不开锅，不识字的小脚母亲万般无奈，就利用冬春农闲外出要饭度饥荒，坚持让女儿读完师范，当上教师。许衍颐的儿子许家林考上中学，家里筹钱无门，就把三代人栖身的五间老屋拆掉两间，卖掉梁檩换成钱，供应儿子读完高中，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。

书越读越多，路越走越宽。进入21世纪，许家村绝大多数家庭实现了让子孙离土进城安居兴业的梦想，家家户户“城里有人”。与此同时，新的问题也出现了。2015年下半年，有近百年的历史许家村小学停办，主因是生源不足。这所小学在校学生规模2003年达到高峰，之后每年一年级新招学生数量都少于六年级毕业人数，递减幅度逐年扩大。2014年全学区15个村庄适龄入学儿童只有8人，校方调查结果：几年内各村学龄儿童将持续减少，生源难以为继，学校只好停招新生，与镇中心小学合并。《许家村志》补录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：全村常住人口减少到273人，仅占户籍人口的60%。

时代发展，社会进步，丰衣足食，老有所养、幼有所教，弱有所扶等理想在许家村一步步变成现实。阅读《许家村志》的平实记述，读者可以感受许家村人发自内心的喜悦，也会产生新的思考：在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且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常态下，怎样走好农村振兴之路？这一重要课题，有待继续探索和创新实践。

诚如《许家村志》主编所言：故乡是一本写不完的大书。

精彩摘录

曾经种植的作物

小麦

系古老粮食品种，20世纪60年代前许家村年年种植，面积多于小麦。1963年种植小麦260亩、大麦250亩，面积相差不多。大麦耕作方法与小麦基本相同，秋播越冬，可适当晚播以避免冻害，也可于二三月份春播。大麦品质不如小麦，但芒种就能成熟收获，早于小麦半月左右，是一年中最早接续春荒的救急新粮。每年夏初，家家户户都用新大麦制作炒面，即把大麦粒上锅炒熟后磨成面，装入瓦罐可以长时间保存食用。

夏季大忙，炒面就是快餐食材，可以少加热水调成主食，也可多加开水调成面汤，加糖少许即成香甜美食。1970年后小麦高产品种推广，大麦停止种植。

黍子

乾隆年版《诸城县志·方物考》对黍子的评价是“易生易茂”“贫民赖之”。

黍子耐涝、耐旱、耐瘠薄、耐盐碱，少有病虫为害，一般在清明播种，粗放栽培亩产可收100公斤以上，条件好时可达250公斤以上。黍粒绵软，含有糖分，是大牲畜的好饲草，集体化期间各生产队保持一定的黍子种植面积，也是为了饲养牲口需要。黍子生育期一般超过120天，消耗地力较大。出米率仅40%左右，口感较差，不如小米、稷子等传统粮种。1965年后推广高产作物，黍子种植面积锐减，1970年后许家村停止种植。

高粱

本地称高粱为蜀黍，相传古代为蜀地之黍。高粱适合盐碱涝洼地种植，有“铁杆庄稼”之称，春播在谷雨前后，也可在麦田收割后灭茬抢播。1970年后曾推广种植杂交高粱，亩产可达500公斤以上。高粱米粒较粗，灾荒年景用作口粮，正常年景主要用作牲口饲料或造酒原料。高粱品种多样，籽粒俗名称秸，农家应用广泛。最常见的品种俗称“秦始皇”，籽粒挺直，是盖屋勒笆的好材料。“席蜀黍”籽粒专用于编织炕席和捆扎。“长筵子”高粱全身有用，米粒为黏性，可做黏糕、包粽子，籽粒用于搭棚插架、围园编篱，长筵子（茎部）用于钉盖垫，脱粒后的高粱穗用米扎扫地笤帚。随着玉米产量大幅增加，以及各种新型材料的推广应用，1980年后许家村很少种植高粱。

黍子、稷子

黍、稷都是古老粮食品种，耐旱、耐瘠、耐盐碱，曾是本地重要粮食作物。

两者同为稷种，区别在于“黏者为黍，弗黏者为稷”；黍子以侧穗为主，稷子以散穗为主。两者均在5月上中旬春播或6月底前夏播，生长期为80—90天，利于及早播茬种麦、栽白菜，也可与大豆、大豆形成二年三作。

黍子经脱壳加工成为黄米，黄米粽子是本地美食。黄米面黏糕是过年家家必备的特色面食。黍米还是从前农家自酿黄酒的原料。稷子曾经用来制作主食，后来种植减少，主要用于春节大锅蒸制发糕，俗称蒸“米面”。

黍子穗形柔顺美观，脱粒后可加工成扫炕、扫面笤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家村黍、稷种植面积保留很少，1970年后停止种植。

水稻

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山东省为增加粮食产量，曾3次发动早田改水田，时称“稻改”。许家村从1963年开始，在村东盐碱地和河南涝洼地开辟水田，栽种水稻多达400余亩，接近全村耕地面积的1/3。水稻亩产量达到400公斤，高于当时小麦产量。那些年，大米成为村民家常饭。

大米好吃难栽。水稻一年一作，清明前撒种育苗，5月初移栽，10月收获，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要求高于旱田，特别是插秧秧是很累人的农活。稻方无滴水洼，无法蹲下，男女劳力只能赤脚挽裤下田，90度大弯腰，一手拿稻苗，一手按每撮6—8株分苗，倒退着插秧。一天弯腰干十几个小时，人人累得头晕眼花、腰酸背痛。每个生产队100亩稻田，干半月左右才能把秧苗插完。

那时的小学每年都放麦收假，秋收假各两周，课外作业很少，每到放假，星期天，生产队长都要安排村里三四年级以上学生下地干活，各家也乐意让孩子帮大人挣工分。农忙时节，学生们早晨上课前，下午放学后，也到地里干活。像插秧秧、拔稻田草这样的活，学生们是主力。

由于水源减少、化肥紧缺等多种原因，1974年后许家村水稻种植面积减少。剩水稻田1983年划小分到户，因为嫌栽稻、管理麻烦，各家改为旱田，1984年水稻种植完全停止。

地瓜

又称甘薯、白薯、红薯，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传入山东。

乾隆年间《诸城县志》把它归入瓜类记载：“近又有白薯来自闽粤，从前所无，今亦为土产也。”地瓜易栽培，产量高，很快传播种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地瓜品种、育苗栽培及冬储技术不断改进，栽植面积扩大，成为高产粮食作物，许家村北岭和沙壤洼地基本都栽地瓜。20世纪50年代后遇到60年代，家家户户主要靠地瓜养活，遭遇灾年地瓜秧也用来充当饭菜。1980年后，小麦、玉米产量大幅增加，地瓜栽种面积迅速减少，2010年后有零星栽种。

蓑衣草、油草

临沂一带称蓑衣草为马蓼，籽粒比黍子小，许家村俗称“草种子”。籽粒磨面食用，叶片用来结蓑衣。油草在传统油坊榨油时用于包裹豆粕、花生粕，也用于编结蓑衣。1980年后蓑衣被雨衣取代，这两种植物在村域消失。

2020年10月20日上午部分村民合影。同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：许家村常住人口273人，其中15岁以下人口15人，60岁以上人口132人。

